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二期 ——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7f)

【本刊专稿】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 ——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余汝信
【研究资料】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王年一
【回首历史】	雨后送伞谈“四人”	欧阳龙门
【文革一页】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施宝华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既非愉悦，更无惋惜
——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 余汝信 •

“将军一跳身名裂”，是1966年4月北京揭批罗瑞卿的小组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改南宋辛弃疾词用之批罗发言的“名句”。文革结束后，有人称其表达了叶的“愉悦”，又有人称之为是叶对罗的“惋惜”。“愉悦”与“惋惜”，实有云泥之别。惟笔者以为两说皆错，前者未能体会文革前夕一派严峻、肃杀的政治氛围，后者则完全歪曲了叶发言的批判原意。

一、揭批罗瑞卿的“小组会议”

1966年3月初至4月初在北京召开的揭发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按当时中央文件的说法，称为“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或“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小组会议”。当时，对罗还是称“同志”的。

据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了彻底弄

清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同志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作为中央工作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的叶剑英，在发言中将会议经过叙述得更为详细：“我们的小组会，是毛主席、中央常委为了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不作结论，不作决议，大家把意见讲完以后，概括起来写一篇报告（工作小组向中央的报告），送请会议的领导小组审修，然后送呈中央常委批示。会议开始，小平同志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的会议整个过程，是在中央领导同志不断指示下进行的。”〔1〕

叶剑英在这里提及了邓小平对小组会议的指示，惟没有提及林彪对会议有什么指示。

叶剑英接着说：

“会议从三月四日开始，四日、五日两天有七个同志发言，对罗瑞卿同志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和实事求是的揭发和批判。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准备作检讨发言过程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会的同志发言完了以后告一段落，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工作小组同志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一直等了六天，到三月十二日，罗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上海会议后就开始准备的，准备了三个月，但他的发言内容和态度是十分不诚恳的，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到会同志听了以后，极为愤慨，即席发言作反驳性批评的十九人。

“三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继续发言的同志有十六人，连上次发言的共二十三人。……

“三月十七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竟于三月十八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

……

“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2〕

八十六篇发言（实质为揭发批判），到底说了些什么？确为一个诱人的话题。而目前，只有

小部分发言为研究者所知悉。如据《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几个附件，人们得知有叶剑英本人及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的发言。而据罗瑞卿3月12日检讨提及的，有刘志坚、张宗逊、邱会作、唐平铸、李曼村、张秀川及邓汀的发言，罗特别提及“李曼村同志批判我对叶剑英同志不尊重，我完全接受。这个问题以后连同对军委领导同志的关系问题，还要作检讨。”〔3〕

二、叶剑英揭批罗瑞卿

叶剑英在发言中借众人之口，为罗瑞卿问题定了性：“同志们的发言，差不多众口一词的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的错误。”〔4〕

叶列举了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一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具体细项是（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具体内容略，下同）；（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

叶列举罗“篡军反党”事实的第二大项是“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军反党的”。叶说：

“（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他自己不向林彪同志汇报，也不准别人反映情况。发现有人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就严加训斥，企图把干部和林彪同志隔离开。罗瑞卿同志经常背着林彪同志，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破坏高级干部间的关系，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所有这些，同志们都充分揭发了。他还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5），煽动一些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向中央出难题，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企图把林彪同志与军区、军兵种的同志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阴谋诡计，十分恶毒。

“（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了纠正罗瑞卿同志搞大比武这个方向性的错误，适时地提出了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同志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多次篡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塞进许多他自己的私货。在第八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曲解林彪同志指示的原意，散布折中主义，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林彪同志在今年元旦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是政治挂帅的典范。罗瑞卿对五项原则只强调第五项（技术战术），这就证明罗瑞卿同志是用技术挂帅来反对政治挂帅。在这些问题上，证明罗瑞卿同志是一个坚持错误，修正真理的典型人物。

“（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无中生有地说毛主席讲四个第一没有阶级性。这完全是可耻的捏造，有汪东兴同志作证。毛主席曾经几次赞扬四个第一，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罗瑞卿同志这样作，无非是想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

“（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马，当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

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同志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

“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是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6）

叶以上发言表明：一、他对罗的问题十分知情；二、他对林彪的地位维护坚决。

三、“将军一跳身名裂”辨

在论及罗瑞卿1966年3月18日跳楼自杀的举动时，叶剑英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7）

叶剑英还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8）

如果没有带着有色眼镜，联系叶剑英发言的上下文，“将军一跳身名裂”的强烈批判色彩是显而易见、绝无歧义的。

说叶“愉悦”的，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她在文革结束后写道：“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悲天悯人，感慨万端，何等风流洒脱。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些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但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9）

罗瑞卿最大的缺点之一，是难与人共事。罗当道时，叶备受冷落，不被尊重。在倒罗过程中，叶为毛所倚重。说比较顺心顺气，应还是可以的。惟在当时政治风云瞬间万变的非常状态下，叶对罗的倒台是否有一种“愉悦”之情，且还有“纵欲后的满足”？笔者同意丁抒的说法（10），罗点点显然是言重了。

说叶“惋惜”的，是杨成武。他在多年后对陈虹说：“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

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慎了一阙词，表示惋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11）

杨成武将叶剑英改的词说成是叶自己填的词，还将原词引述错了不说，更离谱的是他妄顾当时一致批罗（他本人更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发言升温”的包括他自己）的事实，将叶对罗的严厉批判说成是什么“惋惜”（陈虹原文为“惋惜”，正确用字应为“惋惜”）。罗点点说叶“愉悦”，仅为言重而已，杨成武说叶“惋惜”，那真是颠倒黑白了！张爱萍在文革结束后批评杨成武“政治品质恶劣”，是“投机分子”，张爱萍的儿子说杨“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那些上台揭发最凶的、调门最高的、标榜自己最正确的人，偏偏就是过去吹捧得最肉麻的、跟得最紧的”（12），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且，当人家又上了台，他立马改变态度，千方百计地洗刷自己，真一变色龙也！

比杨成武更甚者，是辛子陵（宋科）。他说，叶的改词，是对罗的“痛惜”。

辛子陵的《林彪正传》，笔者曾评之曰：“所谓‘正传’，实为章回小说体野史，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作者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东拼西凑的混合物”（13）。该书涉及北京批罗会议的一段如下：

“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军委设专案组审查批斗罗瑞卿。他受不了栽赃诬陷，十八日气得跳了楼，摔成残废，从此倒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叶剑英元帅知道他是冤屈的，闻说罗瑞卿跳楼，不胜痛惜，吟词半阙：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伴我，醉明月”（14）。

以上不满一百五十字，却起码有五处史实上的错误，一处观点上的错误。史实上的错误是：1、领导揭批罗的，是中央常委领导下的中央工作小组，而非什么“军委专案组”，军委当时也没有设什么专案组。罗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不是军委就能管得了的；2、叶剑英是中央工作小组的主要成员，而不是虚构的什么“罗瑞卿专案组组长”；3、叶在发言中已将罗定性为“篡军反党”，跳楼自杀是“叛党行为”、“可耻行为”，“是垂死的反扑”，何来“知道他是冤屈的”？！4、叶在发言中“哼”（叶自己的说法）的，是他改了两个字辛弃疾《贺新郎》原词下半阙的两句，而不是“吟”了整个下半阙；5、辛的原词，是“易水潇潇”，不是“易水潇潇”，是“谁共我，醉明月？”不是“谁伴我，醉明月”。而更重要的，是观点上的错误——叶哼那两句词的本意，是宣判罗瑞卿“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叶的原话），那是罗的痛批，而绝非是什么对罗的“痛惜”！

某高校历史学教授高华，不仅在其本人的著述中“较多引用了辛子陵的《林彪正传》一书中的材料”（15），还称辛的书“基本能做到言必有据”，“我判断这些材料是可信和可采用的”，这就不能不使人高度怀疑高华教授的判断能力。高华还声称：“据我所知，辛子陵的书已被海外的一些大学作为研读中国当代史的参考资料”。把这种观点错误、史料错误、以假乱真、使大学教授都真假莫辨的野史作为大学的参考资料，岂不是误人子弟？！

(2008年7月)

注释:

〔1〕〔2〕〔4〕〔6〕〔8〕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3〕《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检讨》。

〔5〕原文如此,应为军委作战会议。

〔7〕同〔1〕文。辛弃疾号稼轩,“将军百战身名裂”为辛《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下阙的首句,指汉李陵别苏武事。

〔9〕罗点点:《点点回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215。

〔10〕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当代中国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

〔11〕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12〕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页302—304。

〔13〕余汝信:《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页19。

〔14〕辛子陵:《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第512页。

〔15〕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对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后记(未刊稿)。见www.fyjs.cn。

~~~~~

## 【研究资料】

### 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

• 王年一 •

“文化大革命”中,有“军委办事组”这样一个组织。因何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它又怎样取代了军委常委?下面提供一些资料,仅供参考。

1980年9月23日,原《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在一份揭发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材料中说:“1967年7月25日,……去天安门参加天安门大会。……肖力就把造反突击队(引者注:解放军报社在文革中的一个造反组织,以肖力为首)员一一介绍给林彪。上台阶不久,林问肖力,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肖答:叫造反突击队。林说:‘对,要造反,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正殿!’”(引者注:打倒萧华、搞垮总政有个复杂而反复的过程,这里不再详说)……在吃饭前后,她(指叶群)还对我说了萧华同志很多坏话。并说,今天本来没有通知萧上天安门(7月23日西郊机场迎接谢富治、王力就未让萧去),后来他闹了很久才让他上去。……”

1967年10月上旬,在《解放军报》三楼肖力的办公室,肖力向总政治部卢前安、魏建群、杜嘉等7人传达了林彪的“要彻底砸烂总政阎正殿”的指示(引者注:我访问了杜嘉同志,他说这7人都是总政斗批筹备处勤务组的办事组成员)。第二天,卢前安在总政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又向总政的同志作了传达。

在这前后,北京的大街上贴遍了“打倒萧华”的大标语、大字报(有些大字报纠缠在生活

作风问题上)，总政机关已难于工作。

1968年10月30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1967年夏天，斗争萧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引者注：军委办事组亦称军委看守小组）。开始是4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1968年6月11日，吴法宪在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时说：“原来没有个办事组。文革高潮的时候，‘七二〇事件’武汉发生了陈再道的问题。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勾结军队内部揪军内一小撮，抢枪，冲击军队。那时毛主席还在外地视察。杨成武回来后，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担任组长。后来又相继搞了政工组、军报组、文艺组。军委办公厅是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的事情都通过那里办。军委办事组的问题经办公厅提交军委常委讨论。……”

1967年10月15日，军委办事组给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报告称：“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月24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军委办事组除设有几个联络员、几个秘书外，还有一个负责对‘516兵团’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和一个负责干部学习班（引者注：当时中央有一个干部学习班，由林彪主持，抽调各省军、政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用以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具体工作的办公室。

“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引者注：语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10月16日，周总理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

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1967年10月27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主席于1967年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1967年10月29日，林办批：“林彪同志嘱：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成武、春桥、文元、法宪同志阅，退杨成武同志。”

同日，周总理批示：“我仍建议，此事应先在中央文革扩大会上讨论一次。请伯达同于3月30日例会上提出。”

1968年3月25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5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1968年3月28日，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主席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主席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毛主席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总理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主席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主席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1968年3月30日，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说：“经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批准，改组办事组，由总部、军种主要负责人组成，在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直接领导下主持军队工作。办事组成员由黄、叶、李、邱和吴5个人组成，将来还可以加一个刘贤权同志，黄为组长，吴为副组长。……—李天焕、刘锦平不参加办事组。……”

1968年4月1日，黄永胜、吴法宪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写报告说：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文电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重要文电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聂、叶等同志，粟裕同志与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送。毛主席批示：“此事待议。”

1968年4月4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收缴了军委印章。

1968年4月4日，李天佑以书面形式报告黄永胜：文件已立即停送徐向前、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

1968年11月18日，黄永胜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报告称：“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确定增加谢富治、温玉成两同志为办事组成员，我们非常欢迎。还要求增加李天佑一人。……”1968年11月22日，陈伯达、姚文元批：“是否等几天之后，征求一下江青同志的意见。”黄永胜于11月24日批：“完全同意文元同志意见。”

1968年6月11日晚，黄永胜、吴法宪接见军委办事组全体工作人员。黄永胜说，军委办事组分两个阶段，以前是杨成武任组长，揭杨后办事组进行了改组，增加了3个同志，李作鹏、刘贤权和我，加上原来的吴、叶、邱，共6人。吴法宪说：“中央决定，军委停止工作，军委常委工作实际上已集中到办事组来了，起到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作用。在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直接对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负责。黄总长来了以后，权力集中了，实际上代替过去军委办公会议的职权。”

1969年4月27日，军委办事组拟定了一份“军委48人名单”和“军委办事组名单”报毛主席、林副主席。毛主席批示：“宜加李德生。”林彪批示：“同意主席批示。”



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公布了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以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离职反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大背景下成立的军委办事组,从成立到撤销,存在了4年多。

□ 《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

【回首历史】

雨后送伞谈“四人”

• 欧阳龙门 •

“四人”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谓也。

今人常曰“四人帮”,似乎含有贬义。其实也不尽然,软件设计业的朋友们大都知道,写出经典著作“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s)的四位作者,也被同行戏称为“四人帮”(GoF)。

“四人”似乎属于中性。将近二十年前,我们见到海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派的共产党人使用此语称呼。

此处“四人”、“四人帮”两者等同兼用,均无褒贬之意,希望争取站在一个尽量中性的、尽量客观的立场上,以历史的而非政治的角度,来和大家摆一摆“四人”的龙门阵。

我们在《事后诸葛说老华》的龙门阵里曾将“四人”的政治斗争水平定位为“业余水平”,既然是业余水平,那还有什么可评点之处呢?不然。尽管“四人”是业余水平,他们的教练老毛却是超一流的大师。超一流的大师指点多年,徒弟却始终处在业余水平,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大家摆一摆的龙门阵吗?

所以,尽管是雨后送伞,事后诸葛亮还是提出一些话题来臧否一番,看看“四人帮”是不是有可能不被“一举粉碎”。

(一) 危急存亡之秋,“四人”做了什么?

老毛去世以后,“四人”所面临的局面可以说是“危急存亡之秋”。因为“四人”这支球队一下子没有了教练的,于是一切都指望业余水平的队长江青了。

从老毛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其间不到一个月。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我们故且称之为“三人组”。

我们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四人帮”和“三人组”分别干了些什么，分别给对方和他人留下了什么印象：

“四人帮”的做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雷声大、雨点小”。

九月九日，老毛去世。九月十一日，王洪文绕开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地，有问题及时与王洪文的秘书联系。结果，被下面的人报告了华国锋，华国峰立即制止。以后这件事被认为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罪证。

王洪文的边锋偷袭，被华国峰一个大脚破坏。

接下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纷纷有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不论是这些人是自发的，还是上头布置的，这个账肯定是算在“四人”头上。中国历史上这类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少数几个球迷的起哄，影响不了大局，反而使“三人组”提高了警惕。

接着，在接管老毛的文件、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等等问题上，江青都在政治局会议中与“三人组”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三人组”认识到开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一阵的中场混战，暂时不见胜负。

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提出了老毛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以后，各报纷纷响应，发表呼应文章。以后这件事被指控为“伪造圣旨”的弥天大罪。中国历史上这类故事也不少。

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告诉上海来汇报的人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给上海通电话时说：“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派人给上海捎口信说：“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这段时间，报刊、杂志、电台天天讲要斗争“还在走的走资派”。

这些话、这么大的雷声，“三人组”不可能无动于衷。如果“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指的话，那么这些“走资派”该往哪里走呢？

“三人组”的做法是：“暗中策划，蓄势待发”。

以后我们看到的材料说：

陈云、邓颖超向叶剑英表达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期望；徐向前、聂荣臻派杨成武转告

叶剑英，要他赶紧拿主意；华国锋同李先念、汪东兴多次交换意见，并派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谈；叶剑英同华国锋当面认真磋商，形成了决策。

由于汪东兴的靠拢，实施决策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另外，吴德、陈锡联、吴忠都起了作用，只是官方现在不怎么提起。

十月二日，华国锋制止了“按既定方针办”的说法，指出老毛的真正说法是“按过去方针办”。“既定”也好，“过去”也好，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是权力斗争的表述，表明了“三人组”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与“四人帮”摊牌。此时，抓捕“四人帮”的决策已经传达到中央警卫部队的张耀祠、武建华等人、并且开始拟定具体方案了。

“四人帮”对此毫无所知，继续在唱他们的老调子，继续加大雷声。

十月三日，王洪文还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谁来打倒，怎么打到，一句空话。

十月四日，“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题发表文章，指出“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时，“四人帮”与华国峰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既定”与“过去”的对立，必然使“矫诏”的罪名落在失败者的头上。

那么“四人帮”有些什么具体行动呢？说来可怜，也就是在上海发了七万多支枪、三百门炮，每天有一万民兵、二百辆汽车待命而已。

所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忘记了老话说的什么“会咬人的狗不叫”、“闷声发大财”、“沉默是金”等等。

十月六日…。

“三人组”在最后的几秒钟里一举破门定胜负。接着是球场保安队队长汪东兴带领球场保安冲进球场，将“四人帮”球员抓捕入狱，球队解散，使“四人帮”从此再没有参赛的机会。

（二）十年文革之际，“四人”做了什么？

可以说“没有老毛就没有‘四人帮’”，老毛作为这支球队的教练，在遴选队员、组队参赛、奖惩赏罚，各个方面都花费了极大的心力。连“四人帮”这个队名都是老毛给起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四人帮”队和其他球队的比赛中，老毛还兼任着总裁判，同时又是球场的老板。

由某一个参赛队的教练当裁判，这不是有些荒唐吗？这能保证“费厄泼赖”吗？然而，这就是当时的游戏规则，不是说“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吗？

这个总裁判时不时地会吹黑哨，做出有利于自己队的判决。这就给“四人帮”队的胜出带来莫大的便利。

不过，一个黑哨裁判，再怎么黑，也不能场场都帮着自己的球队吹黑哨。否则比赛就玩不下去了，就没有观众了。比如林彪就中场逃跑，使比赛突然中断。

于是，老毛在保证自己这支球队不输、或者小输一点的情况下，也会有秉公判球的时候，至少要给参赛各方以及观众一个秉公的印象。

“四人帮”队的前身是“中央文革小组”，老毛亲自挑选队员组队，江青在其中担任实质上的组长。其第一场重大的比赛是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队的对抗。

“五十多天”的较量下来，老毛作出裁判：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要“统统驱逐之”。而“文革小组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于是，刘、周、邓联队解散，周恩来队留用，刘少奇队、邓小平队降级。从此，“中央文革”队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打遍天下，名声大振，直踢得周队穷于应付，踢得刘队、邓队认输出局。

其间，老毛也批评过“中央文革小组”，例如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给担当组长虚名的陈伯达亮过一次黄牌警告，捎带批评一下实质上的组长江青。

下一轮比赛是反击“二月逆流”。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因不满“中央文革”队的屡屡犯规，临时组队上场，与“中央文革小组”对抗。

几个回合下来，老毛吹哨了：“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大获全胜，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主的“碰头会”取代了政治局。

接着，文化大革命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了“武化大革命”，“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眼看球赛就没法玩了，球场也要关门了。作为球场老板，老毛当然是不愿意的。

于是就有了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峰、戚本禹红牌罚下场这一幕，以此告知世人是这些“小爬虫”在犯规、在破坏比赛规则，比赛还是要按规矩进行的。以后，球场上的乱局渐渐平静，直到“团结、胜利”的中共“九大”。

可没曾想才过了一年多，以江青为首的这支队又和以林彪为首的那支队在庐山正面交锋了。这回林彪队盯住了张春桥防守的区域猛攻，引得场上场下一片喝彩，喝彩最起劲的居然包括陈毅、钱学森、郭沫若、汪东兴，以至于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等人也跃跃欲试，想上场参赛。

老毛一见大事不好，立即将比赛叫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老毛认识到，林彪这支队太厉害了，关键是还有那么多球迷跟着起哄，大有炸平球场、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于是，直接出场，以裁判的身份指责林队严重犯规，要全体球员包括林彪检讨认输。而林彪则拒不检讨，因为刘少奇、彭德怀的先例摆在那里：检讨过后就是罚下场，罚下场还不算完，直到终生监禁、性命不保。

出乎老毛预料的是：林彪连夜逃出球场，再也不同老毛玩这游戏。

林队瓦解以后，江队大获全胜。中共十大后，“四人”队的格局形成，1974年，这支队被老毛正式命名为“四人帮”。

林队瓦解以后球场上多少显得有些冷清，于是老毛又重新起用邓小平队来维持球场的局面。开始邓小平队和“四人帮”队踢来踢去，各有输赢。老毛也还是从球场的大局出发，没有让“四人帮”独胜，也还是让邓小平进了几个球。

1975年，邓小平搞起了球场整顿，要改变球场规则，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局面，其后果完全有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老毛不能容忍，邓队再次被罚下场禁赛。

当然，老毛也没有让“四人帮”队独霸球场，又引进了华国峰来陪“四人帮”队练球。

从以上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帮”队及其前身打败过刘、周、邓联队；打败过“二月逆流”队；打败过林彪队；又打败了再次出场的邓小平队。

其中主要的因素当然是其超一流的大师教练老毛的战略战术高超，无与伦比，“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同时也有老毛担任裁判、吹黑哨的因素。

可是等到老毛不在了，又没有教练指点，又没有裁判帮忙吹黑哨，“四人帮”队便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再看对手那一边，华国峰勾结了球场保安队队长汪东兴，以前刘、周、邓联队的人都集结在叶剑英名下来支持他。这就使“四人帮”队处在了非常不利的地位。

然而，业余水平的队长江青根本看不到局势的险恶，或者看到了一点，也不拿不出应有的对策，结果就是被“一举粉碎”。

（三）“四人帮”能不能不被“一举粉碎”？

现在，我们来看看“四人帮”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事后诸葛亮认为：不求胜出，保个和局，不被“一举粉碎”，是有可能的。

当时的局面是：“四人帮”队面临两支对手：以华国峰为首的“三七”队和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队。汪东兴只是球场保安，不能算一支球队。

何谓“三七”队？与华国峰有相同的利害关系的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革初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以后又被老毛启用、提升。所以这一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可以说是真正地拥护“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之说的。

“元老”队以“二月逆流”队的人马和复出后的邓小平队为班底，集结了以前刘、周、邓联队的余部，在利益上与“四人帮”是两极。这些人在文革受到的打击比“三七”队更为严重，以后虽然受到启用，但同时也受到压抑。这一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复出的邓小平曾是这一派的代表，在老毛去世前已被再次打倒，叶剑英临时成为这支队的代理队长。

针对这种局面，事后诸葛亮给“四人”送的这把伞是：在老毛去世以后，暂时停止“斗走

资派”的叫器，改唱“全党团结，共度难关”的调子，拥戴华国锋，稳住汪东兴，中立叶剑英，对其他人，甚至对邓小平，都表示出一定的善意，缓和一下矛盾。这样，便可以稳住局势，进一步过渡到下一轮的党内斗争。至于下一轮的斗争谁胜谁负，那就要看事态的发展了。

第一，拥戴华国锋

老毛去世时，华国锋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一。不论老毛是想真的想让华来接班，还是为了平衡各派势力暂时选个过渡的人，总之华国锋是名以上的第一把手。

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从华国锋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到的结论是：“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被迫的明智之举。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被迫”，被“四人帮”所迫。

其实“四人帮”当时完全应该采取“拥戴”的策略，“拥戴”可以是真拥戴，也可以是假拥戴，可以是“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也可以是“团结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下”，口头上给华国锋一些示好；还可以加上但书“只要他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为以后的斗争埋下伏笔。

尤其重要的是要强调“三七”队与“四人”队的共同利益，强调“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仅符合老毛的教导，也符合“三七队”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华国锋感到“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暗示自己，有自己被打倒的危险。

然而，“四人帮”当时可能认为“元老”队已经是“死老虎”，对自己不构成威胁，而华国锋才是自己一派掌权的最后障碍，于是对是华国锋是“打”而不是“拉”，更不是拥戴，屡屡与华作对，最后将华推上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路子。这是“四人帮”被粉碎的最关键的一点。

第二，稳住汪东兴

汪东兴占有关键的地位，握有别人无法取代的权力，类似于球场的保安队队长。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派，他注定要依附于某一派，或者保持中立。

按说，球场保安应该保持中立，但是老毛作为球场老板自己坏了规矩，也曾自己充当裁判，也曾指使球场保安抓捕别人，所以当老毛去世以后，别人也可以照样办理。

从我们后来得到的信息看，“四人帮”拉拢汪东兴的机会几乎没有，而且“四人帮”也未作此想。江青与汪东兴在文革前就结下了怨仇，文革中矛盾大大加深。“四人帮”和汪东兴双方都认识到：一旦“四人帮”掌权，撤掉汪东兴是必然的。所以这就迫使汪东兴加紧靠拢华国锋，使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技术问题一下子得到解决。

其实“四人帮”可以用不同方式向汪东兴表示一定的信任、许诺，稳住汪东兴。至少不要咄咄逼人，不要使汪东兴感到非要马上行动不可，这一点是做得到的。

在《事后诸葛说老华》中，我们说过：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人，江青但凡能在其中拉上一个，“四人帮”就不会那么快被“一举粉碎”。然而“四人”却是一个都没有拉住。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拉”的证据。

第三，中立叶剑英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元老”和“四人”这两个集团势不两立，只是由于老毛的巨大压力，才使矛盾被压住，没有酿成灾难性的爆发。老毛撒手，必有公开的较量。这一点，老毛和叶剑英均有表述。例如，当王震向叶提议解决“四人帮”时，叶做手势表示要等大拇指倒下之后。老毛甚至说到：“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

这一派的潜在能量是巨大的，以前被击溃的刘少奇的人马、林彪的人马，在思想意识和自身利益上都和这一派有共同点，不论这些人之间以前有什么恩怨和矛盾，他们都对“四人帮”实际也就是对老毛和文化大革命不满。

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走资派”，而且还在走。但是，在老毛去世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四人帮”当时大可不必对这些人穷追猛打，完全可以先放人家一马，先巩固自己的力量然后再做计较。甚至对邓小平都可以表现出一种“给出路”的政策。

当然，“元老”和“四人”的矛盾终究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首先应该渡过“危急存亡之秋”，然后再做计较。

老毛去世的时期是中共历史上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必须要有非常的对策。这在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看不到这一点，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依旧“按既定方针办”，依旧高叫“斗走资派”的老调，最终落得个被“一举粉碎”。

事后诸葛亮的这个主意，不一定能保证“四人”赢球，但是可以让“四人”踢成平局，保存实力，以后再战。至少不至于一次输光出局。

可惜事后诸葛亮送这把伞的时候，“粉碎四人帮”那场雨已经下过三十多年了。

（四）“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

三十年前，如果“四人帮”用了事后诸葛亮的那把伞，他们有可能躲过“一举粉碎”的大雨造成的灭顶之灾。对此，事后诸葛亮有较大的信心。如果是那样的话，“四人”队就有可能和其他队一起进入下一轮的党内斗争。其斗争模式可以参看列宁、斯大林去世后的苏共，还可以参看孙中山去世以后的国民党。

那么“四人帮”有没有可能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获胜呢？事后诸葛亮不抱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就专门来摆一摆这个龙门阵。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的问题。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老毛建立起了巨大的功绩、威望和实力。再加上以后中共领导层对他的神化和个人崇拜，使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他既是球场的奠基人、老板，也是比赛的总裁判，既是某队的教练，也可以是某队的队长。而且他的这种特殊地位有着巨大的惯性，一直延续终生。

“四人帮”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崛起，是由于老毛提拔重用、大力支持。这一点是“四人”队最大的资源和强项。

“四人帮”还有一个强项就是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极端性。也就是说，这支球队具有猛冲猛

打的战斗意志。这一点既是老毛赏识的，也是对手惧怕和反感的。作为一个革命的、造反的、激进的组织、团体、势力，其中极端的、极左的派别往往容易压倒别的、较为温和的派别，获得主导权。对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历史中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宗教派别中的极端派、原教旨主义的思潮。

在一定的时间里、一定的条件下，“四人帮”的一些做法也曾与大众的利益相吻合，至少符合其中不少人的利益。这也成为“四人帮”的一个资本。例如，在文革初期驱赶“工作组”的一场比赛中，“四人”的表现得到了相当多观众的喝彩，因为“工作组”此前制造了许多对立面，将许多反对自己的、还有一些并没有反对自己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这一点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起来造反，为什么文革中的“造反”一度得到那么多的人的支持。

以上的这些强项使得“四人”队得以在文革中驰骋球场十余年。

现在老毛去世了，“四人”队的强项开始消失。

首先是“四人”队没有了教练，没有了帮自己吹黑哨的裁判，这就失去了最大的优势。当然，老毛的威望、宠信仍然有一定的惯性，但是“四人帮”显然过高估计了这种惯性的作用，更没有想到这种惯性还会为别人所利用，成为压倒自己的力量。

其次，到老毛去世时中共执政已有二十七年了，执政、建设与革命、造反不同，需要务实、需要稳定、需要秩序。激进、极左的危害已经在“大跃进”、在文革中为人们所认识到。其他各球队和观众们已经厌烦了“天下大乱”，而希望“安定团结”、“天下大治”，这时“四人”的激进、极左已经成了他们的弱项了。

文化大革命到头来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人们对当局、对老毛的怨气越来越大。在老毛的巨大的惯性还存在的条件下，当朝的“四人帮”正好成了人们的出气筒，为老毛背上了大黑锅。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可为一例。

现在，“四人”队的弱项开始凸显。

第一，“四人帮”失去了“党心”。什么是“党心”？实际上就是“党员之心”，首先是“干部之心”，更重要的是“高级干部之心”。

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就使相当多的共产党干部成为批判、打倒的对象。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下至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农村里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学校里的校长，以至于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中间有个省、各县、各个级别，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绝大多数都受到冲击、批斗，不少人遭到毒打、虐待，有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以后他们当中的多数又被“解放”出来，恢复了职务，但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正如老毛说的“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潜意识中他们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老毛不满，但是表述出来则是对“四人帮”不满。

这一集团中的个别人也许会投向“四人”，那还得看“四人”是否接纳，接纳以后往往还得卑躬屈膝地听候使唤。老毛在，大多数人出于无奈，与江青虚与委蛇。老毛一死，绝大多数人与江青闹翻都是迟早的事。对于这一点，“四人帮”的总教练老毛看得很清楚，他说：“将来她

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然而，江青在这一点上就是没有长进，始终处在业余水平。

现在看到的，描述这一派的人在“粉碎‘四人帮’”时候的表现，无疑有些溢美夸大之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能够“粉碎‘四人帮’”，他们是求之不得的。尽管在当时有的人愿意挺身而出，有的人暂时看风使舵，指望他人出头。

所以这一派不太可能与“四人帮”合作。而“四人帮”视这些人为“走资派”，而且还在走。

这些人的力量是在中共夺取政权和执政二十七年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这些人的斗争经验也是丰富的，我们在《事后诸葛亮说老华》中说过邓小平是八、九段高手，叶剑英、李先念是六、七段水平，业余水平的“四人帮”根本不是对手。

第二，“四人帮”失去了“军心”。什么是军心？实际上就是对军队的控制权。在中国要想掌权首先要掌握对军队的控制权。即使是业余水平的“四人帮”也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没有一点行动，但终归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中共的军队和党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失去了“党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军心”。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的许多高级干部受到的打击也是非常重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区别是这种打击较少波及到下级单位，而且在党、政机构被打垮、瘫痪之时，军队的组织机构还保留着。

执政党的军队，从其本身机构的利益来讲就是要维护秩序，维护稳定。解放军在文革中也正是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就直接与扮演造反角色的“四人帮”在机构利益上直接相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再加上军队从来讲究资历、战功，不会仅仅因为你坐在一个高位上就服你，“四人”及其同党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老毛尽管可以任命张春桥当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命毛远新当沈阳军区政委，用陈锡联来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但是到关键时刻仍然是调不动部队，说话没人听。

没有了以上两条，“四人帮”的地位便岌岌可危。如果“四人”是斗争的高手，如果“四人”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没有被“一举粉碎”，那么假以时日，事情也许还有可为。但是由于“四人”是业余水平，即使用了事后诸葛亮的计策，侥幸躲过一关，以后的路也是凶多吉少。

第三，“四人帮”失去了“民心”。“民心”是否重要呢？事后诸葛亮认为也重要也不重要，从长远的观点看是重要的，从眼前的观点看有时也许就不那么重要。那么多长的时间是“长远”呢？这又不好说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王朝内外交困，又是帝国主义列强，又是洪秀全、孙中山的造反，也还是维系了70多年。

但是任何一个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政权都会打出“民心”来做招牌。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让共产党大大地丢失了民心，这笔帐后来全部推到了“四人帮”头上。但是在老毛去世的当时，“四人帮”也的确成了许多人怨恨的对象。这一点从1976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后面我们还要回头来摆这个龙门阵。

此外还有一点，人们在谈论“四人帮”的时候常常忽视，那就是国际势力的影响。

中共执政以后，采取了对苏联、东欧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关闭了对西方的交流之门。1960年代以后，中苏交恶，中共又关闭了对苏联集团的交流之门。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社会里，以老毛那一套左的东西得以盛行。在这样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球场里，老毛又当老板、又当裁判、又当教练、又当队长，“四人”队得以横行，其他的球队和观众也没得话说。

进入1970年代，老毛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采取了“联美反苏”的战略，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开始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来往。

这么一来，人们逐渐了解了人家那边的球场：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不能兼教练；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有任期，不是终身制；人家那边球场上裁判吹黑哨，观众会起哄，报纸电台会揭露；人家那边球场上保安不能因为观众议论裁判就抓人；人家那边球场上……

随着经济、技术、文化、人员等等交流越来越多，人们的思想开始改变，以往的统治方式开始慢慢动摇，以至于有人针对“四人帮”和老毛公开喊出了“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以上的几点可以看作是事后诸葛亮对“四人帮”为什么会被“一举粉碎”的解释，也说明了事后诸葛亮为什么对“四人”的前途不抱乐观态度。

（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为什么没有人“起来造反”？

老毛生前多次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然而等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时候，却不见了动静。上海曾经有点苗头，结果也归于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老毛自身，在于老毛自己的“无法无天”，在于老毛自己的“全面专政”。

这里，老毛其实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建立一套规则、一套客观标准，定义好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走资派”，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该怎么办，对“走资派”应该用什么程序和方式来“打倒”。这样做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和可操作的规则；即使有了制度规则，老毛自己要不要遵守。老毛显然是不愿意遵守规则的，如果遵守规则的话，“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无法发动起来。老毛愿意的是自己“无法无天”。老毛自己当球场老板，自己当总裁判，自己当“四人”队的教练，自己直接调动球场保安队。谁是“修正主义”，谁是“走资派”并没有一个可应用的客观标准，一切由自己说了算，真是方便得很，惬意得很。

但接下来又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自己不在了，继任的老板便可以依样画葫芦。他说谁是修正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只要他能调动球场保安，他就可以抓捕任何球队，宣布比赛结束、自己胜利。而恰恰这个继任老板不是“四人帮”而是“三人组”。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有了制度保障，“四人”就可以有正当的权利而不会被“一举粉碎”，但是有了制度保障，严格遵循规则，老毛也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四人”队的横行；老毛就是不愿受制度约束，才组建“四人”队，发动文化大革命，让自己和“四人”队“无法无天”地横冲直撞。但是，别人当了老板也可以照样办理，招来球场保安，将“四人”队抓捕入狱，还要扣上“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的大帽子。

对此老毛并非没有认识，他只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两难的死结，衡量诸多因素，他还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威”为第一选择。所以他说：“林彪一伙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岂止是林彪，在老毛的权威体制之下，随便谁上台，随便搞什么主义都是不难的。于是，“中央出了修

正主义”，大家要“起来造反”便成了一句空话。

“四人帮”也不是没有一两个死党，也不是没有一点权力基础，上海就有几个人提出过“四人”被抓是“右派政变”、是“修正主义上台”，并且计划过施行武装暴动。也有人提出过：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像巴黎公社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

当时上海真要是“武装暴动”，其结局当然是被镇压，同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不幸。但这未必不是“四人”和老毛希望的。然而终归还是纸上谈兵，墙上画虎。

事后诸葛亮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在老毛：老毛一方面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反潮流”、号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起来造反”，但是另一方面推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党是领导一切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其中的“造反”“反潮流”就必须听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于是培养出来的干部就只能是从上级指示，而不能像巴黎公社的烈士那样能为自己心中的真理牺牲。上海那几个有条件当烈士、为文革牺牲的人，也就是在等这个下命令、等那个发指示的罗罗嗦嗦之中被缴了械的。

对于老毛和“四人”来说这是不幸，对上海人民来说却是免遭血和火的大幸。

（六）“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

“四人”队被球场保安抓捕之时，球场内外曾是一片欢呼。这就说明，“四人”不仅得罪了球场的代理老板华国峰、球场保安汪东兴、对立的球队“元老队”、“三七队”，也得罪了大多数的观众和球迷。这一点在老毛去世之前的“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就已显现端倪。其实“四人”不过是为老毛、为老毛的“文化大革命”背了口大黑锅。

老毛自己也说过：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老毛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

不论文化大革命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论、多么美妙动听的理想，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伤害的人太多、面太广，所以在“四人”被抓捕、文革被否定的时候有不少人拍手称快。正如列宁曾经引用过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

与此同时，事后诸葛亮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给多少人带来多少利益，所以当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时，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捍卫它。

文化大革命使“当权派”中的多数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前面已经说过。这使得“四人帮”失去了“党心”“军心”。即使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得到升迁，他们也都在文革的不同时期遭受过打击，所以并不是完全满意，例如华国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等。像“四人”那样的纯粹受益者是少之又少。

知识分子整体被看作“臭老九”，受到歧视。其中的中上层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打击对象，受到迫害的程度较之第一打击对象“走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的教师群体受到的打击尤烈，使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文革中青年学生，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煽动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组成了各种不同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首先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类，在保守派被打垮的地方，造反派又分裂成不同的派别。随着运动的反复，翻来覆去，今日这派得势，明日那派掌权，保守派

得势的时候打击造反派，造反派掌权的时候加倍打击保守派，也打击不同派别的造反派。斗争从文斗搞到武斗，从拳头棍棒搞到坦克大炮，直把个文化大革命搞成了武化大革命。今天整人的明天被整，明天被整的后天加倍整人，整来整去大家都是输家，没有一家满意。

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后到头来落的是“上山下乡”。这些人的怨气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被捧为“领导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得到了什么实惠呢？工资几乎十年没涨，住房长期紧张，尤其是子女的“上山下乡”成为家家户户头痛之事。农民和历朝历代一样，依旧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穷地区很多人缺吃少穿，难以温饱。

当然，以上这些有可能是局势所然，不完全是“四人”能掌控的。

但是，也有一些较大的利益集团本可能成为“四人帮”群众基础，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捍卫力量，却被“四人帮”和老毛自己削弱：

造反派：文革动乱的高潮时期，人们“咸与造反”，形成众多的群众组织，不论其动机如何，总之是与文化大革命休戚相关。其中的一些头头如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等等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进入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人，其中最突出者当然是上海的王洪文。然而，在文革高潮之后的多次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之中，受到维护秩序的军方和重新上台的“走资派”的毁灭性的打击，纷纷被整肃，以致下狱。而老毛或者为向军方和“走资派”妥协、或者因记恨这些造反者在文革中的失控，竟未加以援手，江青等人也是听之任之，令其自生自灭。于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心灰意冷，觉得是被人利用。日后仍然赞成文化大革命的是少之又少。此乃老毛与“四人”之一大败笔也。否则今日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人还要多得多。

工农兵学员：文化大革命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三年没有招生。等到大乱过去，老毛用推荐制度选拔学生入学。以老毛和“四人”的逻辑，这些人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应该像“百卷英雄”张铁生那样，可能成为“四人”的群众基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这些人当中学习成绩好的，并不一定对文化大革命真心拥护，反而认为自己早就该上大学了，是文化大革命耽误了自己；第二，老毛的“推荐”制度搞来搞去，搞成了“后门”制度、“关系”制度，包括老毛自己本人就通过后门送了几个女生入学，这些人只领“后门”“关系”的人情，也不对文化大革命感恩戴德。于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出现了：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不少的工农兵学员成了反对“四人”的力量。

要说“四人”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没有，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的败落成为一个例证，说明任何政治势力没有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利益集团为其群众基础都是站不住脚的。正如球队需要广大的球迷一样。

~~~~~

## 【文革一页】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 施宝华 •

◇ 发现 • 忧虑 • 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君（有竹字头）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君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君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君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

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誊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 ◇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道：“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持续斗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

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

本规律。要了解和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健康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 ◇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顾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



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急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君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悟，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

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 《炎黄春秋》 2008年第5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